

## 祖古叩仓强巴益西回忆西藏

### 《西藏口述历史计划》记录

2013年12月23日，印度拜拉库比

我出生在西藏卫藏的那通区皖村。有几千人住在皖村。我父母从事农牧，就是耕种和畜牧。1944年我出生时，就获认为一位喇嘛的转世，而在我这生前，叩仓已转世4次。2岁时，别人就已称呼我喇嘛，把我带去拉萨的一座小寺庙，叫叩仓睿土，是我前世叩仓仁波切留下来的继承。父母每年都会来探望我一次，直到1959年中国人入侵西藏。

当时我们是孩子，虽然要记很多经文，可是还有一点自由和时间玩耍。那时，我们通常会出外面玩游戏，例如玩摔跤和踢球。直到傍晚，仍然还有不少孩子的玩乐声传出。11, 12岁开始，我们要去上辩经堂，这就开展了我的辩经学习。当时生活更严谨，我们少了自由时间，不过我不认为这不好。

#### 中國人抵達

1951年中国人第一次进来时，当时我约5岁。听说藏军在昌都发动战役抵抗中国人，可后来战败，中国人挥军直抵我们这。大家都惊惶不安。大约7岁时，大批中国士兵在拉萨出现，人人都十分害怕。当时我们看见中国人，但没有跟他们接触。不过叩仓睿土在山顶，当我们从寺庙走出来，可以看见这些中国人正在下面建筑施工，开山破石。我们不会他们的语言，所以没跟他们说话。

当这些中国人进来，达赖喇嘛尊者不得不逃到西藏的错模（即亚东）避难，这里接近锡金和不丹边境。我当时有点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。这些中国人会不会蹂躏西藏？后来，尊者回到拉萨，就是西藏的首都。中国人说：「我们不会改变什么。我们是来带领西藏发展的，不会伤害你们。我们不会长居这里，发展西藏之后，我们就会回去。」可是大多藏人都不相信这些，他们想：「这些一定是谎言。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做出坏事来。」每个人都很忧心。

接着中国人渐渐宣报将会和平解放西藏。1955年达赖喇嘛获邀前往中国，他没有选择，唯有一去。尊者被送到中国，与一早到达那里的班禅喇嘛会合。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都是西藏最举足轻重的两位喇嘛。许多藏人都非常担心，想：「尊者被邀请到中国，中国人就会禁锢他，他不能回来了。」本地藏民、藏人士兵、中国军队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目送他离开拉萨，有很多人，包括我，都在哭。中国和西藏关系慢慢变得更紧张。终于，我们收到一个消息，要求：「如果所有僧人明天还不离开色拉寺，就会拆掉寺庙。」所以晚上我随着约10个人一组离开了色拉寺。接着6, 7架中国客机飞来，朝着我们投炸弹，向我们开火，杀死了不少人。我害怕极了，尤其有一些飞机飞得很低，低到我可以看见机翼下的中文

字和中国人的五星。有些人知道该怎样做，叫我们扒在地上，不要站起。另外有些人说应该用树叶遮住头部，为免被飞机锁定，不过当时是冬天，四周没有树叶，我们只好扒在地上。我们躲到山里 2 个星期。

中国士兵逐渐来到推行「解放」，他们派传单，上面写了四点：1) 自愿投降；2) 投降及放弃武器，如果你放弃武器，就不会被杀，不会被批斗；3) 你不会被囚禁；4) 你的财产还是属于你的，不会发生任何事。看来有很多人相信并返回。我们不相信传单所说的，和其他很多人一样，我们都认为逃走会更好。所以我们试着逃掉。可是中国军队包围着我们，我们返回了彭波的住宅。

## 中国占领下的生活

一个月后，有人通知我们必须要回去拉萨的寺庙，色拉。我们要每天参加思想改造集会。这些都是洗脑课，告诉我们西藏的旧社会有多坏，我们又是怎样获得「解放」的。每天晚上还会播电影。虽然这些洗脑课很烦人，可是我不用背经文，而我的老师被监禁，不能骂我，更有电影看，这些让我感到自由轻松。我高兴了几个月，可是 1960 年，情况变得更困难，僧人要自己谋生。我们获分派一些土地，要开始耕种。虽然我还是一个小孩，但要背着肥料到农地，要灌溉泥土。

有人说：「中国的政策像一顶湿皮帽。」如果戴上顶湿皮帽，可以盖着整个头，但渐渐会变得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。同样地，中国制抓变得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。接着开始了身体攻击。某位僧人或喇嘛会被带出去，当着其他僧人面前被指骂旧时欺压百姓，这人接着就会受到批斗。

当我从彭波回到色拉，批斗已经开始了，而且有两个人更因此被杀。中国人很聪明，不会自己动手。他们会引导僧人去严打，杀死同修的僧人。他们会这么做是因为人人都害怕会没命。批斗大会经常有。中国人说：「你们必须要揭露西藏旧社会作恶的根。你们不是受到谴责的一方。罪魁祸首是旧社会。」我们不断忍受这样的思想改造长达几个月。

他们开始计划废除达赖喇嘛尊者。起初，中国人没有说应该要废除尊者；反而，他们说：「达赖喇嘛很好。他是位不错的喇嘛，同意了中国和平解放西藏。罪魁祸首是那些西藏的反对派高层。」最终，中国人希望人们认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西藏旧社会作恶的根源。不过，我们有些人说：「中国人认定的犯罪根源是指我们反抗中国入侵，加入起义。我们是自愿的，而不是西藏政府或达赖喇嘛尊者指使我们反抗中国人。我们是基于自愿而做的。」

## 逮捕、当众侮辱、严打

1960 年，批判委员会成立，重新调查哪些人曾经在 1959 年起义反抗过中国人而又未被处罚的，批判委员会就是要清理这些人。那时，偶尔会有些知名人士或有头衔的人被逮捕，偶尔有人入狱。然而我们当时依然担惊受怕，因为中国人说：「群众和僧众里还有披着羊皮的狼。除非你承认自己的罪行和自首，有天我

们总会把你抽出来，就像把头发从牛油拔出来。我们从前做过，没有人可以逃得了。」他们重复说这些，人人都变得非常焦虑。情况严重到一个程度，像我们这些人都感到入狱只是迟早的问题。

后来终于召开一个大集会，我清楚记得那天；大概是 1960 年 9 月 26 日。大约有 10 个人，包括我在内，遭到逮捕，争扎扰攘了一整天，接着被押进监狱。中国人说，我犯下了许多罪行，以致入狱，其中包括藏有枪械，但有三项主要的指控：1) 我是喇嘛，而中国人认为喇嘛是领导阶级的成员。他们声称，喇嘛不工作，以压迫人民来过活；2) 我反对西藏和平解放，曾参与 1959 年起义，因为当时发过护身符给那些反抗中国的人；3) 我试过逃往印度一批判委员会成立后，我意识到不久将面临监禁，于是和两个僧人计划逃往印度。可是这两个僧人在中国人的审讯过程中透露这一事。

我们 10 个人左右当天就在大约 2-3,000 人，包括僧侣和俗人面前受到批斗。殴打持续了接近九个小时，有一小时的午休。我们不得不整天站着，弯着腰，双手向后保持分开。我们身后是拿着枪的士兵和警察。要保持长时间弯腰是十分困难的，如果你倒下了，就会被人踢。我们被打，而且手臂都被折了。一个接着一个，我们被带上前，并被指骂：「你过去做了这些和这些。」列出了所有罪项，而被告人就在附近弯着腰。

那天我被吓坏了，还以为会被杀死。可是，我也想到：「我不是一个人的。还有许多其他人。所以这不算是有什么。」当到了午饭时间，被告可以坐在一起，有一个人看守，大家说：「这是我们的命运。这是我们过去所积累的业力。所以不打紧。」当别人说到这点，我觉得是真的，并没有特别悲伤欲绝或愤恨那些打我的人。这些想法和言论有助我平定心神。

## 獄中生活

我被囚禁在唐宿康一个月多点，那是扎基监狱保安严密的地方。被押到监狱时，我背着毯子，被人用绳牵着走，像牲畜一样。一个月多后，我们这些来自色拉的人被叫出来，带到色拉寺。我们不知道将会被释放还是被杀害。在色拉寺，我们仍然要弯着腰，有关判决被宣布在所有人面前。我被判 20 年监禁，释放后七年都没有政治权利，例如投票。

我不指望在监狱可以活 20 年，因为那里的膳食非常差，我可能会在监狱里死去。判刑后，我们被要求做苦力。我的监房里共有 10 个人。那时扎基几乎有 5-6,000 名囚犯。在监狱里，我没有看见任何家人。这才知道，我的母父亲已经死去了，一个伯父还活着，其他家庭成员还好。不过当时没有联络。经过 17 年，我提早三年出狱，被转到劳动阶段。

三年来，1960 年、1961 年、1962 年，中国和西藏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粮食危机。不只是囚犯，西藏整个国家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。早午晚我们分别得到一小碗非常稀的粥；它只有一丁点蔬菜，比水仅仅好一点。当时没有别的了，甚至没有粍〔炒熟后的青稞粉和茶混成的面团〕、面包或米饭。除了粗劣的粮食，工

作也非常艰苦，至少有七成囚犯死于饥饿。大多数人不盼望他们最终能离开监狱，他们常说：「真希望在我死前可以吃上粑，填饱肚子。」我们正在挨饿，祈求：「如果可以吃饱就没有遗憾了。」

除了粮食短缺之外，我们还必须要达到劳动目标。例如，打石的人要打出一定数量的石头，砌砖的人要砌出一定数量的砖块。每类的工作都有量度，我们必须要达到目标。到了晚上回来后，我们被逼学习。囚犯没有努力工作或听从中国当局就会遭到批斗。在这种无边无际的痛苦下，有些人自杀；一些人用易拉罐割颈，一些人夜里在床上悄悄地勒死自己。

## 文化大革命

藏人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。监狱里的食物已经没有扎基里的那么糟糕，那时我们只有稀粥，不过这时一切都有定量供应。这时有糌粑[炒熟青稞造成的面粉]，可是还不足以抵饿。但更糟的是，我们被告知：「达赖喇嘛必须要受到谴责。宗教必须要受到谴责。宗教是毒药。达赖喇嘛是坏的。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必须要受到谴责。」许多囚犯说：「达赖喇嘛尊者和班禅仁波切是我们的喇嘛，与政治无关。我们不能谴责他们。」

每个人都提出抗议，有些人被判死刑。我抗议，并提出三个要求，这些都写在信上交到有关部门：1) 获得足够的食物，2) 不被要求谴责达赖喇嘛尊者，以及 3) 能够修行佛法[佛陀的教诲]。我说：「就算因此而被杀，我也没有遗憾了，因为我永远都不能谴责达赖喇嘛尊者。如果你们不为我提供足够的食物，我再也不能正常工作。另外，如果不允许现在相信佛法，我将来也会修行的。请赐予我这三点要求。如果获准，我会表现良好；如果没有，我不会表现良好。」

我停止工作八或九天，然后被强迫劳动，勉强活了下来；这是我在文革期间最困苦的其中一次经历。我像动物一样，整天被赶着，经常被踢着，因为我疲累过度，加上背着重物不能行走。获释之前，毛泽东去世，中国政策改变，这救了我一命。